

佳

王雀群

陆天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黑雀群

◎陆天明 著



陆川 画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雀群 / 陆天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404-4239-2

I. 黑…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8502号

黑雀群

陆天明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项目策划: 周艺文 简以宁

责任编辑: 刘茁松

装帧设计: 郭志科 彭意明

统 筹: 谢勤勤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印制: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字数: 350千字

印张: 12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4-4239-2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801361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代序)

陆天明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病。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癆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

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

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

作品，最典型的就《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

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这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先随便扯上几句

一百年前，吱吱扭扭地赶一辆俄式的“六根棍”马车，带几个羊皮水囊，两条黑白花毡子，一小袋奶疙瘩，一大摞硬硬的发面饼，再带上几捆干苜蓿草，一麻包苞米豆子，二三十个洋葱，从哈拉努里镇出发，走白杨河，野骆驼泉，过红山口，马把子，横蹚李将军戈壁，直插那个口宽一百六十六公里的麻西坝苇湖，又称唐乌梁海子的——你竖直了耳朵根儿，给我听清楚了，这会儿工夫不管自己有多困多累，都别给我在苇子深处那些窝棚里打盹歇脚。我不是说，每一个在那达打盹歇脚的人都会遭劫杀，但你必须给我赶紧走。裹紧了裸露出你那棕黑色肩膀头的老山羊皮大衣，给我赶紧走。扎扎地一脚穿过帕拉贡嘎拉戈壁，顶着在第二十一天头上依然焦黄、灼热、耀眼的日头，再抬起你那早已起皱打蔫的眼皮子，这时你就能看到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冈古拉荒原了。你就狠狠地冲它啐上一口唾沫星子吧。冈古拉，这个到老也不死心的寡妇，坍塌了多一半却还耸立在风雪转场道上的破羊圈，长途班车站里那个永远开不大的售票窗口，被杂草和累积起来的喜鹊粪卡住了轴轂因而再也无法转动却总也想转动的旧水轮……哦，冈古拉，它又像一个残存的古堡，永远在辉煌的灰黄中，似隐似现……每年四月，它都会从那条巍然凝固了三百五十亿年的地平线上慢慢隆起。啊，那是条什么样的地平线啊，破损、坚硬，而又顽固。而就在这条地平线上，一百年前分明还耸立着一大片茂密的黑杨林，盘旋着一大片黑雀群。至今没人说得清这片黑杨林到底有多大，到底是从哪一朝哪一代的哪一年开始挣扎出地面的，也没人说得清这个黑雀群里到底有多少只翻飞的黑雀，更没人说得清这些黑雀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说不清。没人说得清。但只要你

站在高地底下，眺望那片高高的黑杨林，并追寻那在四月的天空下翻飞窜掠的黑雀群，你一准儿能发现，顶着成团状翻滚的云阵，冈古拉它晴天一个样儿，阴天一个样儿，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又一个样儿；母狼拼命吼叫时，它一个样儿，母狼们不吼时，它，又一个样儿……是的，它总是那么的变化无常，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定，却又让人割舍不下……

冈古拉啊冈古拉，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想哭。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浑身发紧，心头打战，嘴角生烟，舌尖僵硬——韩起科不只一次地这么跟我念叨过。每一回都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爆了皮的厚嘴唇上，同时挣开一道道焦裂的血口子，颤抖着的眼眶里满盈一汪咸咸的泪水。

二

接下来再跟你说说我和韩起科这狗屁孩子的那点狗屁关系……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还在哈拉努里镇政府机关当一名普通办事员。那天，从贝加尔湖方向平推过来的第一场寒流，裹挟起鹅毛般大的雪片，把满世界搅得浑浑噩噩，沟平渠满。下午，果然通知下来，分烤火煤。镇政府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人赶紧抄起箩筐、麻袋、扁担、抬把子和破铁桶，紧着往小食堂后院跑。那一阵不分男女老少、级别高低、职务大小的谑笑和打闹，把一大群正蹲在院墙外大杨树上观雪景的黑老鸹惊飞了。机关干部中自有少数几个人不上前去跟着“哄抢”这头一车拉来的烤火煤，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像往常一样，掂着自己那个柳条编的破抬把，默默地在一旁瞅着，安心地等待着，任凭越下越紧的雪帘儿铺白我黑棉大衣的肩膀头和那顶已经很旧了的“三块瓦”狗皮帽（当地一种尖顶、不带帽檐儿的皮帽，多数用野兔皮缝制）。我不急着

上前“哄抢”，并非因为我生性清高谦和。不是。并非因为我屋里已经有烧的了。也不是。并非因为今后自有人会给我往屋里送。更不是。你想啊，谁会给一个进机关才两三年的普通办事员送烧的？不会。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己多年来的一个人生信条——但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并善于在关键的时刻，在人前低一下你自以为尊贵的头，或后退一步，适当地给别人让出一部分空间，去挣吃挣喝，到最后，你绝对吃不了亏。你也许瞧不起我这种人，更瞧不上我这人生信条。我不跟你争论。有言道：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哩。我不强求你跟我一致。我也强求不成。但我要告诉你，这句充满我辈人生辛酸的话，其实千百年来只被国人说出了一半；而它更重要的另一半却往往无数次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十个手指必须不一般齐，这世界方成正局。而我，天生就是一个在后头稍着站的“小拇指”。那又怎么样呢？小拇指再小，也是呆在了手上，总比那捂在黑臭黑臭的鞋窠里的大脚拇趾强啊！您说呢？

对不起。扯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十来分钟后，保密员小哈穿着一身紧身的小花棉袄，小心翼翼地冲我走了过来，以她独有的那种矜持和木然，在我面前站定，细声细气地通知我：“领导找。”小哈比我大一岁，或两岁。我一直挺喜欢她。她其实长得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喜欢她。我还喜欢她身上那一股气味儿，那是一种由蛤蜊油、百雀灵和廉价香皂无意间调和成的气味儿。这种混合气味儿，在哈拉努里镇那条唯一的街道上（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街道”的话），并不稀罕。但只有闻到她身上的这种气味时，我才会隐隐地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一阵隐隐的几乎又是无法抑制的心跳，总会想起她床上铺着的那条深蓝色的塑料床单和深秋时分帕拉贡嘎拉湖面上那冰冷刺骨的波纹。但，无论是这种“晕眩”，还是那种“心跳”，我都没跟她表白过。我不跟她表白，绝对不是因为我在生理上不行，或心理准备还不够。不，我生理上心理上都很行。之所以不跟她表白，说穿了，很简单：我们有位年轻的镇长跟她关系不一般。镇长姓宋，名振和。宋

镇长虽然早已有妻室家小，但他还是超常规地跟她确立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据说，在他还没当镇长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不一般”的艰难历程。而尤其让人感到无奈而又悲壮的是，天性矜持和木然的她，居然会接受这种“不一般”。而且据说，她就是为了这种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不一般”，才执意地坚持不婚不嫁，独身到如今。为此，我不是没苦恼过。但，正如机关主管后勤生活的协理员大叔劝慰我的那样，“这瓜，不是你老弟摘的咧！”我虽然私下曾跟他激烈辩论过，但最后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他老人家对事局的这种“冷酷”而又中肯的结论，把所有内心的躁动，都深埋掉了。只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户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户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户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痛……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唯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品，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

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他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的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的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啜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口，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膘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缕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这会儿，他最起码的，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的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对于他突然间向我宣布的这个任命，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口气顿时也就憋在了胸膛里。让我去冈古拉当“高级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哈哈，真他妈的好听。前边我已经捎带着跟你们把冈古拉描述过一番。是的，冈古拉就是这么一个狗不啃骡不蹶，连公猪都懒得往上爬的糟心地儿，更别再说什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类的狗屁气话了。整个高地绵延起伏在一片由盐化草甸土、氯化物硫酸盐碱土和青黑色戈壁片石、乳白色细砾石、焦黄色大小沙包、深浅莫测的苇湖沼泽，还有那些苦豆子、骆驼刺、铃铛刺、梭梭、芨芨、琵琶柴和旱獭黄羊野

兔……一起构成的荒原之上，只有较少一点让人瞧着比较舒心的灰漠土。这灰漠土上办起了一个农场，整个农场只有两千来人，两千来人只拥有两部外线电话（其余的都属于那种“场内分机”）。也就是说，在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两千来个活人只能靠两部电话机跟外部世界沟通。而这两部电话机还都处在场长同志的直接控制下：一部安装在他办公室，一部安装在他家。也就是说，在冈古拉，不经这位场长同志点头批准，任何人都别想接近这两部电话机，更别说用它跟外界联络了。而唯一的公路交通，是十天一趟的长途班车；唯一的邮路来往，是七天一趟的邮班。要我去执掌的那所所谓的“高级中学”，就隶属这个狗屁不是的农场。整所“高中”只有三十六个学生……这就是对我的“提拔重用”？就是“往我肩膀头上压担子”？真谢谢了！谢了……我竭力镇静下微微颤栗起来的身子，尽量不动声色地去打量镇长同志，希望从他脸上那络正在消失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中，能得到证实，这所谓的“提拔重用”只不过是闲来无事跟我开的一个无聊“玩笑”而已。但打量结果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不是玩笑。这是真事儿。他们是真的在把我往那棵“歪脖子树”上吊啊。

“收拾收拾，明天黑早动身。镇里派车送你。”他说。

“干吗恁急？又不赶着去救火。”我赶紧问。

“告诉司机，车走西坝河子黄沙梁那条路。晚上歇三五零八兵站。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负责接待。”他又说。

“干吗非得歇三五零八？”我又问。

“一会儿就去组织组把调动手续办了。”他又说。

“我从来没当过教师，这一下子，急不棱登地就让我当校长……是不是……是不是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试着再问，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任命推托了。

“还有啥问题没有？”说着，他居然站起来要走了。

操！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直奔头顶上去了。什么叫“还有啥问题”？我提的所有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哩。还有啥问题？我呆站在

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他却已经走到铁皮柜旁边，从楔在土墙上的那根粗大木钉上，去取他那件狐皮领大衣和那顶剪绒皮帽了。“小伙子，咋的啦？走啊走啊，我还有事哩。”他催促着，以为自己在打发另一个土鳖推销员哩！

三

啊，冈古拉……

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